# 边疆开发活动中的人和环境

戴 逸

清代边疆开发史是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清代二百六十八年间，倾注很大力量于边疆的经营与开发，中国的版图得以奠定，民族的团结大大增强，国家的统一更加巩固，边陲地区的经济文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农业生产、耕地垦辟、水利灌溉、道路交通、商业贸易以至晚清时期的荒地放垦、修筑铁路、设置厂矿、建立行省等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绩。清代对边疆开发的规模和深度，远远超过汉唐盛世。

所谓“开发”，即是人对环境的利用、改造。边疆有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自然环境指地形、气候、雨量、土质、动植物、矿藏等等，人利用这些资源谋求生存和发展，自然资源的或丰或啬，极大地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开发的速度。政治环境指当地的政局和秩序、战争还是和平？统一还是割据？和中原地区的联系是密切还是松散？有了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谈得到开发。中国是个大国，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辽阔广大的边疆与海疆，包括东北、蒙古、新疆、西藏、滇桂以及台湾、海南，或为内陆，或为海岛，或属战乱，或属安定，情况千差万别。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决定了人们不同的活动方式，既有其共同性，也有其特殊性，认识和揭示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规律是边疆开发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人是开发活动中的主要因素。人改造、开发环境，使其成为可享用的富源。边疆地区，地广人稀，为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经济效益，必须有足够数量并具有一定生产技能的劳动力，必须保证人口达到充足的数量和相当的素质。因此，边疆开发的前提是人口的流动和迁徙。清代统一国家的巩固，形成了适宜的移民条件。清中叶后，中原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出现相对人口过剩、人均耕地锐减，生计维艰，形成人口“压力”，而边疆地区稳定的社会秩序和优裕的谋生条件，形成人口“引力”。在“压力”和“引力”的作用下，大批贫苦人民纷纷奔赴边疆海岛。“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这句谚语形象地表述了移民的法则，人口的流向和流量总是取决于地区之间压力和引力的差度。两三百年前，人口密集的中原地区发生了“爆炸”，大批无产业的流民被强大的冲击波甩向四面八方，从中心四散幅射到边疆和海外（华侨），随着这个人口“爆炸”和“扩散”而来的即是边疆和海岛的开发和繁荣。十八世纪以来的这一人口“爆炸”过程应予充分研究，它的规模、时间、后果。当时移民的方式、路线、组织、以及政府的政策、措施，边疆研究中的这些重要问题目前尚模糊不清以至完全空白。

当移民来到新的环境中，和当地土著民族一起向大自然进军。当他们通过劳动向环境索取富源时，即是在改变环境，对原有的生态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大自然有自我修复的机制，轻度的破坏，经过一段时间，就会自动地恢复生态平衡。故边疆的某些荒僻地区，虽有人类活动，但人口很少以采集渔猎为生，亿万年来生态环境并没有什么变化，但大规模的游牧和农垦活动，特别是应用机器等近代化手段后，生产力发展，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越大，对生态平衡的破坏越严重，其破坏程度超出了环境自我修复的能力，人们就必须投入力量，

给以补偿，使环境达到新的生态平衡。边疆开发活动必须遵循这一索取和补偿的法则，否则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国边疆许多地方经过长期开发，荆莽剪除，洪荒已辟，富源大开，表面看来，环境变得越来越驯服，越来越适于人们居住。但是环境在被改造的同时，生态条件即在发生变化，由于违背了索取与补偿的法则，发生了森林破坏、牧场退化、水土流失、沙漠扩大的现象。环境在许多方面又日益变得“严酷”，变得难以栖息和活动。边疆开发的历史说明，人通过劳动对环境索取可供消费的财富，但环境的给予是有限度的，并且也不能是单方面的，贪婪无度的索取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对自然的索取，应继之以对自然的补偿，才能使富源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所以边疆地区的开发和整治必须同时进行，两者是相互联系，不可脱离的。

环境和人是边疆开发活动中的两个重要因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种种规律有待于加深认识和详细阐明。我想：这样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对当前边疆的现代化建设也具有借鉴意义。

# 需要开展香港史研究

余绳武

清代边疆史地这门学科有许多非常重要的然而至今国内很少有人研究的课题，香港史就是其中一个。过去一百多年中，香港经历了一系列沧桑巨变；现在，随着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署，这颗南海之滨的珍珠回归祖国之日已经在望。人们不仅迫切希望更多地了解香港的现状和前景，也希望更多地了解它的历史。开展香港史研究已成为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

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帝国的“直辖殖民地”。残酷的殖民压迫和种族歧视相结合，形成了这种体制的基本特征。在英国统治下，香港的炎黄子孙长期受到非人的待遇，遭受种种世间最难堪的凌辱和虐待。据十九世纪后期到过香港的一些英国人记载：“华人被当作一种有用的、低于人类的动物对待，经常挨打。”“外国人一贯虐待华人。在香港街道上，每隔两分钟定会见到欧洲人用手杖或雨伞痛殴苦力的情景。”港英当局明文规定，华人晚间一律不准上街，有事出门须先向警方领取临时通行证，还要手提灯笼，以资识别，否则严惩不贷。如此荒唐的种族压迫制度，居然在香港实行了五十多年之久。早期港英警察有权随时搜查华人的住宅，华人一举一动都受到管制，动辄得咎，每年横遭逮捕的华人约占全港人口3%至5%，以致监狱中经常拥挤不堪，臭气熏天，疫病流行，死亡率极高。警察还有权鞭笞华人，例如1846年4月，一天之内就有五十四名华人因细故被公开鞭打并割去发辫。1871年港英当局更规定每星期三为“鞭笞日”，定期在广场上鞭打华人。研究昔日的港英统治，可以丰富人们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认识。

英国攫取香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强化它在远东的战略地位，把香港变成英国进一步侵华的中心据点。与这一目的相适应，最早的四任香港总督——璞鼎查、德庇时、文翰、包令都